

政治經濟學的悖論：

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

◎ 李金銓

全球化的步伐隨冷戰結束而奔騰躍進，前蘇聯集團的政體紛紛崩解，亞洲、拉丁美洲各威權政體發生戲劇性的轉變，全世界媒介研究蓬勃發展，顯示以西方為中心的媒介研究必須重新定位。英美的媒介政治經濟學通常漠視比較研究，這些理論架構來自工業先進和政治穩定的富裕國家，無法解釋第三世界複雜而曲折的經驗。學界假設媒介必須服務、提倡並參與民主，其實媒介可以增進民主，也可以破壞民主。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完美的民主，將來也不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理論建構不同的民主想像。媒介與民主的關係論爭不休，常取決於用甚麼規範性的標準和在哪一個社會脈絡中看民主。達爾格倫（Peter Dahlgren）¹站在後現代的角度聲稱：在西方國家人們對宏觀的代議民主已失去興趣，他們遠離以國家、國會、政黨為長期認同的政治，投注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認同，這種微觀政治的特徵是以階級、性別和種族差異建立短暫的聯盟。此外，論者說：在穩定的民主國家裏，媒介日趨瑣碎，向商業壓力低頭，製造無知，讓大眾滋生失落感。我贊同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觀點：「在非西方，現代性

（modernity）方興未艾，對那些被傳統與正統束縛的文化來說仍是巨大的挑戰。」²《共產黨宣言》說：「幫助資產階級拉下封建主義的武器，正被用來對抗資產階級本身。」這說明了現代性在西方和非西方有不同的解放潛能。如謂西方人厭棄代議政治，「非西方」人飽受國家暴力壓迫，追求代議政治而不可得；西方人無懼喪失代議權，否則後現代者歌頌「生活方式的政治」有何積極意義？他們主張的「全民民主」，假如沒有堅實的自由制度為基礎，恐怕只是空中樓閣罷了。

西方批判派學者質疑人們安於現狀：為甚麼不多反抗一點？人們要反抗的，我想不應是代議民主本身，而是代議民主的不足。西方批判派學者站在西歐和北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社會的邊緣地位，向權力中心的意理霸權作出挑戰。他們追求理想的「第三條道路」，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又反抗列寧主義的獨裁。其中最吸引人的莫過於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柯倫（James Curran）³用這個概念設計了一套民主的藍圖，兼容並蓄民間、專業、社會市場和私人企業各領域的媒介。凱里（James Carey）從杜威（John Dewey）的實踐主義提倡「重獲公共生活」⁴，所謂「公共生活」在歷史可能沒有存在過，但這個概念可以刺激我們想像：除了成為現狀的俘虜，還有哪些「可能的政治」？冷戰結束，列寧主義破產，資本主義成為全球化的驅動力，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從自由左派建構以社會民主為基礎的新「第三條道路」⁵，企圖跨越代議民主的限制，並把民主從政治延伸到經濟和文化領域。柯倫在一篇關於媒介與民主的宏文裏，呼籲讓自由派的概念「安息」，因為舊理念「與當代現實沒有太大關係」⁶。在我看來，

他的呼籲只會讓自由主義的觀點「早夭」，而不得「安息」。哈林 (Daniel Hallin) 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表示自由派觀點漸失意義。」⁷但非西方國家多半沒有自由制度，媒介受獨裁控制，大家習以為常。癡肥症和厭食症是富人的問題，窮人病在營養不良。在自由民主國家剖析自由派的神話陳義過高，和在專制國家摧殘自由多元的價值（例如抹煞新聞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完全是兩回事。本文旨在援引中台港媒介的實據，來闡釋政治經濟的複雜悖論。

一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取徑

我曾經比較自由多元主義和激進馬克思主義的媒介政治經濟學⁸，它們刻畫兩個不同的政治圖像，對媒介的民主潛能有殊異的期待。表1綜述一個對比的「理想型」(ideal types)，刻意放大差異以便觀察，但在推衍時謹慎為要。縱觀歷史，早期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解放出來，自由派理論支持「負責任的資本主義」(responsible capitalism)，反對專制王權踐踏個人主權。激進派企圖從晚期資本主義解放出來，站在理想化的社會民主立場，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累積漫無止境，財富分配不公。兩派觀點都是現代性的一部分：自由派強調自由，激進派鼓吹平等。激進派解放先進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自由派解放大部分受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統治的國家。這裏僅以粗筆描繪兩派的異同，無法細緻討論內部的差異。

表1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取徑

	自由多元主義	激進馬克思主義
政治綱要	現實的、實用的和注重實效的政治；支持「負責任的資本主義」。	理想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支持各式的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類型	「政治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的」政治經濟學
適用的地區	「晚生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主要處於威權統治下。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自由民主或社會民主。
政權的角色	首要的。塑造經濟和媒介政策，威脅媒介自由。	次要的和從生的。
市場的角色	提倡多樣性，抵消專斷政權的權力。	資本積累和集中限制媒介多元，並產生傳播資訊分配的失衡。
媒介專業主義	提倡媒介多元和自主，「可信度的信條」。	「策略性儀式」，強化既定秩序；媒介專業人員在表達公眾聲音時專斷粗暴。

資料來源：Chin-Chuan Lee,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激進馬克思主義者⁹從上往下看，我稱之為「經濟的」政治經濟學 ("economic" political economy)。他們抱持激進的人文主義理想，居高臨下，批判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背叛民主的理想，特別是「軍事與工業複合體」肆無忌憚地追逐經濟利益，製造文化霸權，導致「不完全

的解放」和資源分配失衡，以至於扭曲「公共領域」。這個批評鞭辟入裏，但對國家角色的解釋往往失之片面，而且一筆帶過。激進派學者批評多元主義者太注重國家與媒介的關係，而忽視資本主義私有化對傳播工具的影響。他們何嘗不是把國家的角色邊緣化？究其原因是西方自由國家的政權對媒介的管制不像專制暴力那麼赤裸裸，何況在法律和制度上還保障媒介自由。激進派馬克思主義談到國家政權時立場迥異：工具派學者¹⁰認為國家權力逕自為大公司的利益服務，國家與資本同牀同夢；其他人認為國家與資本也有緊張的一面，國家是民主鬥爭的中心場域，只有國家足以挑戰大公司的利益，只有國家才能促成社會財富的公平再分配。為此，後者鼓吹國家應該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矯正市場對公共表述所產生的扭曲，例如湯普森（John B. Thompson）主張國家干預媒介的產權秩序，以營造「管制的多元」（regulated pluralism）¹¹。莫斯科（Vincent Mosco）呼籲批判派學者要分析國家如何干預傳播工業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國際化¹²。

無論如何，激進派學者始終未曾嚴肅分析過「專制政權」。耶魯大學媒介法學者費斯（Own Fiss）¹³認為政權與民主亦敵亦友，政權補充市場的缺陷，卻不能取代市場的力量。但我敢斷言，開發滯後的國家由專制政權全面支配政經和文化資源，根本是民主的敵人，不可能是朋友；它們不僅掌握關鍵的新聞喉舌，建立整套新聞檢查和政治高壓的制度，並收編私有媒介到侍從關係去，支配甚至壟斷媒介賴以生存的政經資源。有的激進派學者（如許勒 [Herbert I. Schiller]）提倡以前蘇聯、中國（文革時期）、古巴那樣粗暴的列寧主義取代剝削性的世界資本主義。這些專制統治如今已一一破產，這種先入為主的全稱命題碰到處理細緻的政治問題，實在無濟於事。

激進馬克思主義者從根本上批評資本主義。媒介專業主義孕育於資本主義的邏輯，他們認為這是一套為現有體制服務的意識形態神話。施萊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指出，媒介專業主義的前提是深信現有的自由民主秩序，其根深柢固到了不言自明的地步¹⁴。換言之，唯有凍結社會制度的基本假設，才可以談客觀、平衡這些專業技術的問題；一旦質疑第一層次的假設，專業主義必將失去立足點。塔克曼（Gaye Tuchman）認為¹⁵，媒介專業主義建造「策略性的儀式」（strategic ritual），幫助媒介維持一種客觀的假象，其實整個新聞網都環繞著合法的機構，新聞節奏跟官僚機構的運轉同聲共氣，以致支配性的觀點瀰漫於主流媒介，抹煞甚至消滅社會上的異見。媒介長期的意識形態效果，就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說的製造社會同意基礎，從而建立文化「霸權」。激進派抨擊，客觀報導拒絕審查權力與特權的基本結構。凱里¹⁶譴責媒介專業主義賦予專業人士太多權力，以致公眾從政治的「參與者」淪為「旁觀者」，此說糅合了對傑斐遜式民主的緬懷以及對哈貝馬斯式民主的憧憬。激進派知識批判的火氣強勁，但對新聞實踐影響微弱。

另外一面的多元主義者從下向上看，建構各種圖像和概念（如媒介專業主義、意見市場、制衡），用以對抗國家暴力的機制，我稱之為「政治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political economy）。自由派的言詞講實效，不追求浪漫，卻給各種群眾抗爭和解放運動（包括民族、種族、性別、階級）帶來希望，並賦其以正當性。當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運動，無不以「民主、自由、科學和人權」為訴求。免於國家政權直接蹂躪的市場秩序，當然比各種貴族式的、寡頭式的、獨裁式的政權更自由更解放。

激進馬克思主義抨擊媒介專業主義，自由多元主義則視之為一種理想，促進意見的多元，鼓舞媒介去制衡權力結構。自由派的政治是可能的（possible）政治，不在建造理想的道德王國，

而承認人類的不完美性，提倡溫和改良，懷疑任何宏大的設計，反對大規模狂風暴雨式推翻整個既有秩序。從台灣、南韓、墨西哥、南非以及南美這些例子來看，市場競爭的確有助於擴大自由表達的空間。即令中國大陸，媒介在非政治領域的言論尺度也寬多了。媒介專業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原則一脈相承，從未幻想政治的烏托邦，但在新聞實踐上畢竟建立了堅實的記錄。美國的媒介多元主義深植於一套恆久價值，溯及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進步運動」，媒介揭發政權腐敗和財團濫權不遺餘力¹⁷。「客觀性的信條」為媒介創造空間，也為弱勢團體提供防衛的武器。

這兩種政治經濟學的取徑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在本體論不分先後，否則不但忽略政經與全球脈絡的重大差異，也犯了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說的「具體情境錯置的謬誤」（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它們代表現代社會生活中兩種不同而相關的歷史情境。我要重述兩個論點：第一，「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用來分析威權媒介，而「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用來分析資本主義民主的媒介；第二，在許多轉型的制度裏，不管是從威權轉向民主統治，或從民主轉向威權統治，兩個取徑都可能不安而矛盾地並存。華人社會處在大轉型的前沿，給觀察媒介與民主化提供了生動活潑的社會實驗室：儘管（也可能正因為）中國大陸的媒介歷經政治高壓，二十多年來媒介在國家資本主義中生猛而扭曲地發展；台灣歷經了混亂、曲折而動人的民主化進程與媒介變化；香港媒介似乎熬過了主權轉換的風浪。我的關注點集中在媒介與民主間的錯綜關係，本文希望帶進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個案研究，探討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理論取向。

二 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控制

自由多元學派聲稱，資本主義市場培養相對獨立於國家控制的社會領域，市場是民主的必要條件，但未必是充分條件。這個命題可以分兩點來闡述：第一，歷史上，沒有市場化基礎的民主，未之有也；第二，市場化未必導致民主的實踐，但從西班牙到智利，從匈牙利到俄國，媒介的確「加劇了威權主義的崩潰」¹⁸；台灣的媒介結合社會運動，更如虎添翼。某些國家以媒介自由化為手段，政權為了取得其他政治目的而不得不然；在智利，媒介自由化卻是「皮諾切（Augusto Pinochet）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承諾所產生的意外副產品」¹⁹。中國領袖最羨慕新加坡那個「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中國在政府控制下發展市場機能，當然談不上民主，卻導致了消極的自由化，其特徵是沒有了文革式漫天遍海的群眾動員，我稱之為「降低動員的自由化」（demobilized liberalization），它比毛澤東專政時期有三大不同²⁰：

首先，中國的媒介自由仍居世界之末，但其媒介制度已經從全權主義轉變成為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色的威權主義；政治與經濟兩條脈絡若即若離，市場既和國家的權力相糾葛，又試圖與之分離。政治控制與市場自由化的矛盾降低了經濟、文化的政治化程度，給媒介創造若干喘息的空間。雖然國家政權仍然高度威權而武斷，干擾民間生活，但已必須因應市場自由化所帶來或隱或顯的各種因素，不能像文革時期一味靠「抓革命」來「促生產」。媒介是市場的得益者，沒有理由反對黨國的意識形態；在政治領域它們當然是黨國的喉舌，而在非政治領域，市場自由化也擴大了媒介免於政府干預的「消極自由」²¹。只要與黨國統治地位無涉，媒介開始有相對的自主性，程度雖然遠遠不夠，但比起文革時期卻有天壤之別。媒介促進政治變化的「積極自由」仍低得令人扼腕，而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的鐘擺勢必造成意識形態的矛盾、派系的鬥爭和政策的反覆。

其次，市場日漸多元，為了爭取受眾，媒介競相在新聞風格和市場策略上推陳出新，作大膽甚至冒進的嘗試，但受制於政治風向而搖擺不定²²。媒介為黨服務，還是為市場服務？沿海城市的大眾化媒介受惠，與內陸媒介的差距愈拉愈大。1970年代黨國媒介籠罩一切，1980年代當紅的是逃避政治的軟性晚報，1990年代得寵的是貼近日常生活的都市報。都市報新興，資金雄厚，乃拜賜於都市居民收入日豐，廣告迅速成長。媒介在新聞方式和內容方面都必須滿足市場的需要，但無論怎麼試，總盡量避免踩意識形態的地雷。沿海和內陸省份媒介的差距拉大當然不是好事，黨報的式微卻未必是壞事。

1980年代多項調查研究顯示，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政治改革氣氛的鼓舞，許多記者自詡扮演「看門狗」的角色，以制衡政府的濫權和腐敗。經過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媒介放棄了活躍的政治角色，不敢逾越政治雷池半步，轉而投入商業化的汪洋大海，盡量撈取商業利潤。總編輯們坦承患了精神分裂症，報紙前幾頁支持計劃經濟，中間幾頁提倡混合經濟，剩下的就鼓吹市場經濟了。記者們對於有償新聞已習以為常。有人說市場化是媒介腐敗之源，我卻首先要歸咎於威權政體與失序市場肆無忌憚的勾結。當局像痙攣似的，想到了才下令打擊一下，當然毫無成效。媒介的腐化和有償新聞散布各階層，黨的宣傳幹部也是整個腐敗場景的一環，道德不比別人更優越。

第三，何舟形容以市場為導向的黨國媒介以「資本主義身體」戴一張「社會主義的臉」²³，身心分裂。他說，媒介從原先的黨國喉舌轉變成為「黨的公關公司」，其任務不在洗腦，而在維護黨的正面形象和正當性。從許多研究調查拼湊的總體印象得知，縱然記者們仍帶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與精英傾向，不過愈來愈少人會自認是黨的宣傳員，愈來愈多人以資訊的提供者自居²⁴。在這種背景下，揭露腐敗和違規的「樣板」可以為媒介帶來尊敬、聲望和利益。有時個別領導會默默鼓勵調查報導，以對付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但絕大多數矛頭還是針對低級官僚，不敢觸及位高權重者²⁵。市場意識為媒介孕育了新節目和新種類，敏銳把握一些公眾熱衷的議題（如消費、環保以及其他社會議題）。消費和環保意識抬頭，表面上沒有直接威脅黨國，但如果台灣的經驗可資借鏡，經過長期潛移默化，它們卻可能培植政治公民權之所繫的權利與義務觀念。

媒介不再鼓吹宏大的政治改革了。一家都市報的總編輯向我坦承，他的政策就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連拍蒼蠅都得冒風險，蒼蠅背後的老虎可能會反撲，責怪媒介揭露其下屬劣行是和他們過不去。我們在外面覺得這些事平淡無奇，但在中國走出這一步卻廣為受眾歡迎，使少數報紙的發行與廣告激增。從1980年代後半期的高峰撤退以後，媒介專業主義一直委頓不前，黨國仍然隨時可以掐死它的苗頭，特別是當局自認陷入敵對力量的包圍、或權力高層派系鬥爭如火如荼時尤然。

黨國控制的市場化媒介面臨很大的限制。政府進退維谷，一方面釋放經濟的能量，以作為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將市場化納入官方的軌道。說起來，黨國進行經濟改革原是迫不得已的，絕無意破壞自身的權威，而是在文革和天安門鎮壓以後，只有經濟改革才能於崩潰邊緣挽回它的正當性。「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有獨裁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私人不許擁有媒介，個個記者都是國家僱員。話說回來，經濟改革需要更多和更好的資訊，以改善管理、財政和科技的基礎結構，與僵硬的國家意識形態並不相容。宏觀的經濟政策變化所孕育的媒介生態是利弊兼具的混合體：一方面借社會主義之名，行資本主義之實，雖離民主化尚遠，卻提升了在非政治領域的消極自由；但媒介並未培育民主的公民意識和核心價值（如公共意見和制衡）。最後，媒介的試驗流於短視，易受政治風向左右。

媒介集團化把黨跟市場的矛盾演繹得淋漓盡致。為了在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抵禦外資的激烈競爭，黨國糾集了一群財力雄厚的核心機關報，像一隻海綿吸收那些不賺錢、混亂又不聽話的小媒介，組建各種媒介集團，但它們大抵是長官意志和行政命令的產物。當局以前猛批西方的傳媒集團，現在所為何來？官方說西方媒介集團由「腐敗的資本家」所控制，而中國的媒介集團受黨直接領導。其實，媒介集團讓黨國振振有詞擺脫對媒介的財政負擔，也讓核心機關媒介從接管和兼併中獲利。報團以黨為靠山，一心一意獲取巨大的財政利益，但顯然低效、浪費而且官僚氣息濃厚。黨國畢竟要尊重資本的營運，或吸納，或利用，或妥協之，再也不能像文革時期那樣赤裸裸地鎮壓，也算默認黨國的權力有時而窮。

本文不擬辯論自由的民主或大眾的民主應該成為中國終極目標，而是要評估這兩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徑和經驗證據有多吻合。提倡大眾式民主的人必須證明西方激進批判派足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反之亦然。趙月枝追述1970年代末爭取的主要是大眾式的民主，1980年末知識份子和學生追求帶有精英色彩的自由民主，而到1990年代新興資本主義則剝奪了農民和工人的媒介話語權²⁶。她說，有些改革者擁抱自由的民主，以圍堵普羅大眾的聲音。我對她犀利的分析沒有異議，但對於中國新左派的言詞卻有點看法。他們認為今天中國媒介的首要問題不是國家政權壓制人民，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支配力量及其所伴生的商業文化，也就是盲目的市場崇拜促使新聞實踐偏離大眾民主²⁷。中國的新左派受到後馬克思主義、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批判理論的影響，認為市場與民主（或言論自由）沒有必然的關係。他們應和西方的批評者說，市場導致了「民主的失落」以及公共領域的危機。中國沒有民主，沒有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不知以市場為導向的媒介如何腐蝕掉本來就不存在的東西？（哈貝馬斯在2001年春天訪問中國，批評中國新左派急於建構反帝的論述，誤用他的理論來為國家民族主義和獨裁傾向辯護。）歸根結柢，這些激進派學者認為大眾的民主比自由的民主更勝一籌，但他們的論述承襲了破產的毛澤東主義烏托邦。他們的理論如欲立足，先得把如何實現這些激進的目標講個明白。以全球化的論述來看，激進派學者似乎把「國家與全球化」的軸心傾斜到全球化那邊，嚴重忽略了國家這邊的因素，甚至與毛澤東在革命年代提出的「反帝、反封」的雙反原則背道而馳。今天中國新左派反帝比反封還熱衷。

中國緊鑼密鼓全面「入世」，會為國內媒介的政治經濟帶來巨大而不可預測的挑戰。外國主要的媒介集團多年來一直在積極開拓與中國高層領導的關係，虎視眈眈，環伺在側，隨時想進軍中國市場。如果中國市場打開以後，外資最可能攻堅的是極具潛力的電信業或某些媒介經營領域（如廣告業），但政權絕不會將其言論要塞拱手交給外資或是私資。壟斷使媒介的盈利高達一般企業的雙倍，這個意識形態和經濟最後的「禁果」，黨絕不會輕易交給挑戰者。

三 台灣：在民主變革的前前後後

台灣和南韓媒介在右翼資本主義專制政權統治下爭取自由，激進馬克思主義似乎無力解釋這個鬥爭的過程。台灣從1949到1986年戒嚴時期，媒介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國家政權與少數精英結成侍從結構，寡頭統治源自政治壟斷，而非靠資本在「自由」市場的累積。解除戒嚴使新聞檢查告終，固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以前受壓制的市場能量，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違離民主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國家機器與資本互相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這時激進派的觀點開始有解釋力，供我們檢驗資本集中如何限制媒介多元。這並不意味多元主義觀點已失去意義²⁸。

台灣當局當年以戒嚴為名，鎮壓大眾參與；聲稱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反共必須有統一的領導。媒介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機器。當局壟斷黨、政、軍的「三結合」，控制龐大的言論喉舌，並吸納私營媒介為意理輔助機構。如同拉丁美洲的「官僚威權政權」，台灣的國家政權也一手拋胡蘿蔔一手揮大棒，私人關係是侍從結構的潤滑劑，關係互惠但不平等；當局嚴禁媒介與其他社團或工會建立橫向聯盟。敢向權力結構挑戰者，則必備遭迫害。

威權黨國容忍林茨（Juan Linz）²⁹所說的「有限的多元」，媒介在政治上的限制很嚴，在非政治領域則有相當的自主權，這是典型的「國家統合主義」。台灣的威權政體，如斯坦尼蘭德（Martin Staniland）³⁰所敘述的，「組織政治表達，但並不巨細無遺或全面決定它的內容」。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挑戰主要來自邊緣的另類媒介，特別是70年代的黨外雜誌，以及90年代的有線電視。戒嚴期間歷經三十七年的報禁，停止發放報紙和電視台營運的新執照，但當局低估小媒介（黨外雜誌和有線電視）的顛覆力量，它們只在生存的邊緣徘徊，不惹當局操心，不料後來與方興未艾的政治運動結盟，共同生猛對抗強大的國家機器。它們跟新聞檢查官捉迷藏，公開挑戰官定的「真理」，啟迪民智，動員群眾支持反對派候選人，最後還灌輸運動團體內部的敵愾同仇。

在體制內，《中國時報》站在國民黨開明派那邊，《聯合報》支持黨內保守派。解嚴後，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分裂，為媒介提供了一絲喘息的空間。儘管主流媒介大抵上支持既有秩序，卻大力提倡民主價值（如公眾的知情權、制衡、憲政），間接試探官方的底線，又營造文化氣氛，催化民主轉型的水到渠成。尤其是《中國時報》不畏橫逆，突破封鎖，毅然刊登警備總部圍剿陶百川的事件，以及報導民進黨成立的消息，阻止民主化的逆轉。有趣的是，在戒嚴時期，許多自由派記者紛紛投稿黨外雜誌，批評和揭露政權的陰暗面。不管政治運動還是大小媒介，莫不深受美國理想化的自由民主概念和實際的人權運動所鼓舞。

解嚴以後，國庫不再通黨庫，黨國媒介斷了津貼而迅趨式微。政治景觀丕變，國民黨內部分裂，反對黨合法化；主流媒介作為社會的「指標」，為了維繫其本身的正當性，必須如實反映權力結構變化的動態，因此出現了比以前寬廣的聲音。可惜其視野仍然局限於選舉政治、派系鬥爭、族群衝突和反共統獨這些狹隘的議題，很少觸及一般勞工的情況。國家認同懸而未決。解嚴後商業資本勢力不斷抬頭，逐漸與國家建立新的聯盟，反對黨在2000年第一次扳倒國民黨而執政。自由派的政治開始冒頭，當然比威權統治好得太多了，但它的缺陷也開始暴露，激進派的觀點於是登場。

解嚴以後，二百多家報紙趕著進入市場，卻只有二十五家能夠生存，其他盡遭淘汰，其中《自由時報》不惜殺雞取卵，藉著自殺式的價格戰以及隨贈在市場上立足。90年代報紙廣告殺出一個意想不到的競爭對手——有線電視。報禁解除多年，國家政權仍牢牢壟斷電視不放，反對勢力接二連三抗議而罔效，只好不顧禁令，公然非法播放粗糙的有線電視。後來海外衛星信號溢播進來，給捉襟見肘的有線電視增加了許多免費頻道，吸走不少政府控制的電視網觀眾。接著發生一連串事件：美國要求台灣阻止有線電視網侵犯其智慧財產權，包括電影、音樂和錄影帶，否則將以關稅制裁台灣的進口。國民黨政府盡可不睬反對黨的抗議，卻不能敷衍來自其保護國的壓力，於是加速立法，將二百五十家非法而粗糙的有線電台合法化，並放鬆了外國進口節目的限額，這引起了有識之士對文化自主的憂慮。台灣的規模經濟有限，最後由兩家經營媒介的商業集團瓜分全島的有線電視。2001年以來台灣經濟惡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持續緊張，又適逢全球市場不景，媒介經營困難。2003年5月《蘋果日報》在台創刊，更將重寫遊戲規則，媒介齊向庸俗化和瑣碎化邁進。解嚴以來，民主轉型鬥爭不懈，在媒介領域的確看到國家

與資本的互動複雜而多變。

四 香港：自由媒介秩序的喪失？

港英在殖民統治時期維持了一個自由（liberal）的媒介秩序。它明知無法排除「中國因素」，於是退而控制遊戲的規則，讓親中和親台勢力出版報紙互打擂台。香港媒介涵蓋整個意識形態的光譜，盡可放心攻擊北京和台北，但不能攻擊港英政權；直到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英國和港英政府才成為媒介批判的對象³¹。媒介大體支持「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只是惱怒英國在談判中節節潰敗，一再失信。到了1990年代，媒介再度支持英國臨去秋波、姍姍來遲的有限度民主政制改革，但這正是中國當局所憎惡的。香港是逃離共產革命的大量政經難民棲身之地，政權變化激發民眾深沉的疑慮和焦急，以致資金外逃，大量中產專業人士移民國外。主權轉移引起媒介兩種反民主的傾向，一是所有權的改變和集團化，二是新聞的自我檢查以及道德淪喪³²。

第一個反民主的傾向是所有權的改變和集團化。整個新聞的光譜大量減縮了：親台報紙覺得前途茫茫，紛紛自動關門大吉；親中資本家購買了批判性政論雜誌，不旋踵間把它們關掉。主流報紙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上市，用以分散政治不明朗所帶來的財政風險；其中好幾家貿然投資房地產而大蝕其本，另一些試圖跟大陸媒介建立商業夥伴而鎩羽而歸，還有一些通過上市聚集厚資，在擁擠的市場大量購買媒介。此外，國際資本家（如默多克 [Rupert Murdoch]）和海外華裔資本家（《南華早報》的郭鶴年和《明報》的張曉卿）紛紛購入香港主要媒介，他們在大陸的投資可觀，還千方百計開拓那邊的市場。他們屬下的媒介能否恪守言論自主？局面如此動盪，資金外流還來不及，黎智英卻挾重金入市，於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裹挾著性和暴力這兩大「法寶」，接連爆發好幾輪割喉的價格戰。惡性競爭致使好幾家財力薄弱的家庭式報紙雜誌倒閉，成千的媒介工作者失業。《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佔領七成的報紙市場，報導風格和市場策略引得媒介爭相仿效。許多主流媒介的市場地位下降，甚至被併購，買方通常與北京當局有密切的私人、商業或政治關係。鳳凰衛視開播時，默多克信誓旦旦要用先進的傳播科技擊敗極權政體，結果跟大陸資本愈黏愈緊；別說默多克多年來一直開拓與北京高層領導人的親密關係，犧牲新聞原則在所不惜，大陸資本不但進駐鳳凰衛視，更擁有亞洲電視。另一家無線電視台也小心翼翼，不敢激怒北京。

第二個反民主傾向是記者的自我檢查以及新聞道德的沉淪。為了怕新政權對媒介造成真實的或想像的危害，媒介自我檢查言論。媒介再也不能靠港英政府的絕緣而逃避中國的壓力，北京明白警告香港不許變為「顛覆祖國的基地」。北京有巨大的資源進行獎懲：它可以控制新聞來源，決定給不給誰報導的機會；也可以在商機上提攜某些媒介老闆，特別是中資在港的勢力愈來愈大，可以拿廣告費對特定媒介進行邀寵；北京可以給某些媒介老闆政治地位，讓他們接近政治權勢人物³³。許多企業大亨、媒介老闆和知名記者都被收編，有人沾沾自喜，有人表裏不一，有人謙恭臣服。調查研究顯示，大部分記者在理念上贊成西方客觀的專業規範，但在日常工作卻頗有顧忌，不敢批評中國當局³⁴。有些媒介機構採取不專業甚至是違反專業精神的做法，例如為敏感話題設框架，轉換社論的語氣和立場，停用某些敢言的記者和專欄作家，為的就是怕激怒北京。

以往所謂的「專業報紙」政治上膽小，言論閃爍。聳動性的報紙對政治不感興趣，以渲染性和暴力為能事，販賣這些東西不止政治安全，而且商業獲利；北京當局縱然不喜歡，也樂於裝聾

作啞，任其發展。聳動性的報紙罔顧商業道德，偽造故事，侵犯隱私，並且無理取鬧，騷擾批評它們的人。非政治化、聳動化和小報化的傾向無處不在。儘管民眾有時怒吼，政府不時威脅要立法管制，但聳動性報紙不但在市場上得意，還使得「專業性的報紙」（特別是《明報》）迫於商業壓力向低級趣味低頭。與自我檢查大相逕庭的是《蘋果日報》，它出於商業考慮，故意激發香港社會潛在的反中情緒。

通常，自由媒介秩序受到危險時，自由多元（liberal-pluralist）的觀點才會跟著凸顯。媒介專業主義建立「可信度的信條」（creed of credibility），使媒介能在資本市場裏維護正當性。即使證據確鑿，沒有媒介老闆和從業人士願意承認自我檢查。話說回來，雖然媒介有自我檢查的趨向，畢竟沒有淪落為北京的玩物，政策報導的透明度仍高。媒介發展出一套「策略性的儀式」（在這裏我把塔克曼³⁵提出的概念重賦新意），來阻擋權力結構加諸它們的壓力。所謂「策略性的儀式」是媒介利用公眾利益或社會所認同的價值為名，發展出一套論述方式，以增進自身言論的空間。媒介如何維護專業自主，而又避開政治風險，這是一種防禦性的姿態，並不浪漫，但假如沒有專業意識，情況會更悲慘。

我在另文列舉了三個策略性儀式³⁶。第一，媒介訴諸新聞的平衡原則，把各種不同意見（無論支持或反對北京）並列；第二，社論與專欄作家分道揚鑣，社論避免觸犯北京，言詞閃爍溫吞，但有些專欄作家卻在內頁嚴厲批評北京，例如《明報》副刊專欄擺出左中右平衡的形式，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的矛盾於焉獲得辯證的統一；第三，新聞敘述方式趨於溫和，鈍化批評的稜角，盡量以事實取代意見，陳述時採用圓滑的及條件式的語句。政權遞嬗以後，媒介不再將矛頭對準北京，轉而批評北京任命的特區行政長官。當香港的利益與北京所持的立場相悖時，媒介可以用「一國兩制」護身，對北京比平時批判嚴格一點。當然「一國」是媒介不容質疑的。金錢與權力的互動將決定香港自由媒介秩序的前途。

五 餘 論

本文根據中台港三個華人社會的經驗，說明自由多元主義與激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何互動，著眼點在媒介的政治經濟及其解放和民主的潛能。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自由多元主義主要批判的是國家政權，可以用來解釋威權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國家；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集中於批判資本，可以用來分析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媒介。自由多元主義似乎適合解釋戒嚴時期的台灣媒介，受威權政府威脅的香港媒介，在某個程度也解釋得了中國大陸市場化的威權媒介。中國的新左派不強調中國國家政權的鎮壓，而強調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強制力量，因此把國家與全球化的天平向全球化傾斜，我看是片面的說詞。

第二，在轉型制度中，這兩個觀點不安而矛盾糾纏共存在一起。在這三個華人社會，台灣率先完成了缺陷的民主轉型，媒介一如在其他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可以批判執政當局及其領導人，但對私人資本比較寬厚。換言之，代議民主的相對勝利致使自由多元主義的觀點略失意義（然而其意義仍然是可觀的），這時引入激進馬克思主義，可以解釋媒介集團化如何限制表達的空間。相對之下，在香港，當自由媒介的秩序和成熟的資本主義受到威脅，人們對於媒介專業主義和自由的關注也登上了議程。中國大陸的新聞媒介仍受嚴厲控制，比前共產波蘭（當時國家控制的媒介必須跟反對派的團結工會以及教會媒介競爭）或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開放改革時期的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今中國媒介的集團化是國家政權指揮棒下的合奏，但政府畢竟必須和它所製造的市場力量協商。

我們仍有四個問題懸而未決。第一，從中港台獲取的證據能夠概括到甚麼地步？我們還得做許許多多的比較研究才會有較清晰的線索，但前蘇聯也許是個比較的對象。戈爾巴喬夫推行政治改革，解除中央集權的共產黨機制，引進一些脆弱的代議政治和新聞自由，但終因經濟失敗，自由機構並未真正生根，最後全盤崩潰；媒介失去經濟依靠，十多年來陷入官僚主義、腐敗和外國併吞的泥淖中。鄧小平的中國採取相反的途徑，先以市場化阻止急劇的政治變化，中國媒介的轉型是不是比前蘇聯順暢些呢？

第二個問題，冷戰結束以後，這兩個取徑是不是仍有意義？我相信，不論在知識論上或在政治上，它們對資本主義及其媒介的基本看法與冷戰無關。冷戰結束，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地方不自由，自由派對國家政權的批評仍饒富深意。西方激進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批評的是市場對媒介的扭曲，而不是辯護蘇聯的媒介控制和濫權。針對前共產國家媒介日趨商業化和集團化，為老精英分子和西方跨國公司聯手兼併，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應該是擲地有聲的。

第三個問題，全球性與民族性如何互動？全球結構為國內媒介帶來機會和壓力。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權力愈來愈大，國家和資本的互動漸漸搬上國際舞台。香港和台灣希望世界媒介盯住中國，以約束它的行為。中國日漸嵌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會給媒介結構和角色帶來巨變。中港台之間的政經與媒介互動值得更進一步研究。

最後，本文提出了一正一反的觀點，尚須在更高的抽象層次提出一個「合」的看法，辯證分析國家與資本相輔相成的關係。國家對資本一方面促進，一方面阻撓。市場跟國家政權討價還價，同時又削弱國家政權的力量；國家政權倚重市場，又壓制市場。就算在民主國家，政府還是可以用市場來約束特定的媒介組織，遑論一般威權國家？在美國，大部分人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媒介，一隻「看不見的手」幫助媒介逃脫政府的控制，卻也使媒介受制於商業利益的瘋狂邏輯，引發扭曲的競爭。在中國大陸，黨國一手培育的市場力量對媒介產生了壓力，同時又削弱了黨的權威。在台灣和香港，國家和資本的交叉關係愈來愈不確定：台灣的國家政權結構重組，國民黨失敗迫使媒介的政治經濟再洗盤；香港的政經變化產生了反民主的傾向，表現在媒介的集團化和新聞道德的淪亡，但媒介以專業化為名，保持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和公信力。這篇文章雖還沒有發展出整合的觀點，但希望能夠引導對未來的思考。

註釋

- 1 Peter Dahlgren, "Media, Citizenship, and Civic Culture",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London: Arnold, 2000), 310–28.
- 2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329.
- 3 James Curran,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A Reappraisal",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82–117.
- 4 James Carey,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Edge of the Postmodern", in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ed.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228–260.
- 5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 同註3。
- 7 Daniel Hallin, "Media, Political Powe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in *De-*

- 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ed.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London: Routledge, 2000), 97–110.
- 8 Chin-Chuan Lee,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36.
 - 9 Nicholas Garnham,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1990);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2 vol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997); Vincent Mos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1996); Herbert I. Schiller,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2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 10 如註9 Schiller;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 11 John B.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2 見註9 Mosco, 頁202–203。
 - 13 Owen M. Fiss, *Liberalism Divided* (Boulder, CO: Westview, 1996).
 - 14 Philip Schlesinger,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 15 Gaye Tuchman,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 16 同註4。
 - 17 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
 - 18 Richard Gunther and Anthony Mughan, eds.,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
 - 19 同註18, 頁13–14。
 - 20 Chin-Chuan Lee,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 no. 4 (November 2000): 559–75.
 - 21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22 Zhongdang Pan, "Improv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68–112.
 - 23 Zhou 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112–51.
 - 24 Chin-Chuan Lee, "Servant of the Party or the Market?: Journalists and Media in China", in *Media Occupations and Professions*, ed. Jeremy Tunst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40–52.
 - 25 Yuezhi Zhao,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 no.4 (November 2000): 577–97.
 - 26 Yuezhi Zhao, "Media and Elusive Democracy in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8, no. 2 (2001): 1–44.
 - 27 同註20。
 - 28 Chin-Chuan Lee, "State, Capital, and Media: The Case of Taiwan", in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124-38.

- 29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ed.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4), 175-411.
- 30 Martin Staniland,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5.
- 31 Joseph Man Chan and Chin-Chuan Lee,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s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1).
- 32 Chin-Chuan Lee,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Structure,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288-336.
- 33 同註31。
- 34 Chin-Chuan Lee,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 no. 2 (Spring 1998): 55-73.
- 35 同註15。
- 36 同註32。

李金銓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講座教授（1994-98）。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講座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3年6月號總第七十七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